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赋权理论视角下女性网络自组织行动研究
——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例

研究生姓名: 周珂芯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张淑芳 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新闻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

研究方向: 网络与新媒体

提交日期: 2021年5月31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周珂蕊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签名： 张淑芳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校外)签名： 周尚艺 签字日期： 2021.6.1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 / “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周珂蕊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签名： 张淑芳 签字日期： 2021.6.1

导师(校外)签名： 周尚艺 签字日期： 2021.6.1

**Research on Women's Network
Self-Organizing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heory——Taking Stand By HER as
an example**

Candidate : Zhou Kexin

Supervisor: Zhang Shufang

摘 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我国互联网“提速降费”的改革，新媒体技术的使用门槛越来越低，人们在利用网络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生产信息与知识，互联网正在迅速解构与建构中国社会生活网络的主要框架，网络几近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功能技术的更新赋予了新媒体用户更多权力，用户的主体性得到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互联网产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性，网络空间聚集了更多的视线与声音，让公众注意到了女性医护人员面临的“失权”困境。女性作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她们的生理期用品需求却掣肘于传统思想和集体无意识，处于“失语”状态。因此，为女性赋权、争取相应权力是改善女性社会处境的根本途径和有效实践。

本文从赋权理论视角出发，以网络自组织发起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例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自组织发展阶段的分析，对行动过程中的赋权机制进行解构。其次，从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效果入手，探讨传播在行动过程中的赋权作用。再次，从行动的表层效应和深层效应两方面出发，对自组织行动的赋权成效进行分析。最后，提炼总结自组织在网络空间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并提供解决策略，期望能为其他同类型组织提供有效的借鉴与指导。

关键词：赋权理论 网络自组织 女性行动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eform of "speeding up and reducing fees" in our country's Internet, the threshold for using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getting lower and lower. People are using the Internet to obtain knowledge while also continuously producing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e Internet is rapidly deconstructing. With the main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social life network, the network is almost integrated with people's lives. The update of functional technology has given new media users more power and the user's subjectivity has been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my country's Internet industry showed great development vitality and resilience. The cyberspace gathered more sights and voices, which made the public notice the dilemma of "loss of power" faced by female medical staff. Women are the main forc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but their demand for menstrual products is constrained by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nd they are in a state of "aphasia". Therefore, empowering women and fighting for corresponding power is the fundamental way and effective practice to improve women's social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ister War Epidemic Relief Operation" initiated by the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as an example for analysis. Firs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stage,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in the action process is deconstructed. Secondly, starting with the content, form, and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discuss the empowering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course of action. Thirdly, starting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surface effect and the deep effect of the action, it analyzes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self-organizing action.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self-org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yberspac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solutions, hop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other organizations of the same type.

Key words: Empowerment theory; Network self-organization;
Women action

目 录

1.绪论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
1.1.1 选题背景.....	1
1.1.2 选题意义.....	2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
1.2.1 赋权与性别研究.....	2
1.2.2 赋权与网络自组织研究.....	4
1.3 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5
1.3.1 研究问题.....	5
1.3.2 研究方法.....	5
1.4 概念界定.....	7
1.4.1 赋权.....	7
1.4.2 新媒体赋权.....	7
1.4.2 自组织.....	7
2.赋权理论基础概述	7
2.1 理论溯源.....	8
2.2 理论要点.....	8
2.3 理论模型.....	10
3.赋权理论视角下女性网络自组织行动分析	11
3.1 阶段分析.....	11
3.1.1 第一阶段：行动发起与自组织的建立.....	12
3.1.2 第二阶段：专业的集体行动.....	14
3.1.3 第三阶段：相关活动的展开.....	17
3.2 传播策略.....	18
3.2.1 传播内容全面而客观.....	19
3.2.2 传播形式丰富而多样.....	21

3.2.3 传播效果积极而有效.....	22
3.3 赋权成效.....	24
3.3.1 表层效应：物资保障到位，社会活动开展.....	24
3.3.2 深层效应：改善刻板印象，推动政策出台.....	25
3.4 本章小结.....	27
4.赋权理论视角下女性网络自组织发展困境.....	29
4.1 平台方面：信息操控，影响传播效果.....	29
4.2 受众方面：数字鸿沟，知识下沉困难.....	29
4.3 内容方面：性别污名，信息缺少把关.....	30
4.4 本章小结.....	31
5.赋权理论视角下女性网络自组织发展启示.....	31
5.1 平台方面：优化算法，保护公共议题空间.....	31
5.2 内容方面：去污名化，帮助提升个体效能.....	32
5.3 受众方面：线上线下，启发提升双线并重.....	32
5.4 本章小结.....	34
6.结语.....	34
参考文献.....	36
后记.....	40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2020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WTO)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性爆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70%的医务工作者是女性^[2]。同样,在中国,根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4.26万名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中,女性医务人员占湖北省医疗队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二以上^[3],是应对疫情的主力军。

生理期作为女性独有的性征,女性卫生用品是女性医护人员的必备用品。然而,女性卫生用品无法进入医疗物资或紧缺物资的目录清单,女性医护人员被忽视的生理需求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期的需求既是私人话题,也是公共议题,涉及全球一半人的健康与福祉(沈洋,2020)。为保障一线女性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2020年2月7日,@梁钰stacey响应国家号召,于微博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并建立志愿者团体,致力于向湖北省女性医务人员捐赠女性卫生用品,提供物资保障。其中,该团体95%以上的志愿者是女性,她们在微博上呼吁公众关注女性医务人员的月经需求,并利用社交平台进行募捐及统筹工作。截止2020年3月22日,该志愿者团体共筹集资金253万余元,共发生291笔配送,帮助了湖北省205家(支)医院和医疗队,超84500名女性医务人员。

新冠疫情的爆发暴露了女性在公众眼中仍是一个“明显的隐形人”(conspicuous invisibility)。索菲·海尔曼在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响应的研究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明显的”是指每个人都知道女性医务人员在那里,并承担了大部分的护理工作,但是对于设计和实施全球卫生战略的机构和政策来说,她们又是“隐形”的,她们需求或被遗忘或被视为“次要问题”(Harman,2016)^[4]。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第二空间,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距离,拓展了沟通渠道,并且能够有效聚合相同价值观的人群,

^[1] <http://home.xinhua-news.com/gdsdetailxhs/share/6820979-?pageflag=iframe>

^[2]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0/0711/c14739-31779818.html>

^[3] <http://video.sina.com.cn/p/news/2020-03-08/detail-iimxyqvz8802714.d.html>

^[4] Harman, S. (2016). Ebola, gender and conspicuously invisible wome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3),524-541

建立自组织，成为网络共同体。除此之外，伴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网络平台逐渐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新渠道。疫情期间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再一次证明了网络有助于促进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彼此发现、连接和汇聚。行动帮助84500多名女性医护人员解决了生理期困难，在她们的呼吁下，中国妇女基金会、恒安集团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组织也相继发声并做出行动。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体线上、线下的配合举措，都在推动着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具有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1.1.2 选题意义

理论意义：赋权来源于empowerment一词，国内学者也译作赋能、增权等。自上世纪70年代赋权理论出现，到现在被广泛应用到多领域、多学科的实践中，其实践意义在国外各类问题的解决路径中得到验证。与国外的研究热度相比，国内对于赋权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相对缺乏，其中，关于新媒体赋权的研究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本文想通过分析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对其赋权的路径进行研究，从而对赋权理论中的新媒体赋权形成较完整的认识，期望引起国内学者对其的进一步思考。

现实意义：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能够看出女性可以成为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从本文的现实意义角度来讲，一线的女医务人员依旧属于“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地位。例如，防护服的尺寸不适合大多数女性医务人员，她们中的许多人患有经期疼痛，无法长期更换卫生用品，此外，月经羞耻在我国的性别观念中仍占据较强地位，在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推进的过程中，嘲讽、谩骂等负面情绪也因此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当下的现状：为女性赋权仍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因此，以赋权理论为视角对女性行动进行分析，有助于打破陈旧观念，维护女性权力，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与本选题有关的研究是赋权和自组织相关研究，笔者将其细分为赋权与性别研究、赋权与自组织研究。

1.2.1 赋权与性别研究

赋权（empowerment）又译为增权、充权、激发权能等，是一个多层次，宽泛的概念体系。赋权对象一般为‘无权’、‘少权’的弱势群体，在此前提下，赋权

理论与性别议题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有学者对农村妇女的赋权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团队负责人在赋权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妇女的赋权取决于个体效能感、行动、环境的互动关系^[1];有学者以赋权理论作为切入视角,关注社会工作下农村妇女的素质提升工作,从身体素质、知识素质、身体素质三方面提出策略。认为农村女性综合素质的提升事关农村的长远发展^[2];有学者通过分析社会工作案例,认为妇女除了面临个人层面的经济困难外,主要还面临社会、文化、制度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必须重视培育妇女自我发展意识与能力,才能帮助妇女实现赋权^[3];有学者以“妇女能力建设与农村发展项目”培训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反思国际组织介入培训并赋权妇女存在的问题,认为文化差异、主培人员设置和培训效果的评估需要得到改善。

另一些学者运用赋权理论对单亲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进行研究,提出策略,通过社会工作者,增强单身母亲群体权能^[4];有学者通过对再婚女性赋权进行研究,认为应该更新弱势群体的判定,培养专业人才促进赋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打破传统思想藩篱,发展个人主义,促进赋权理论本土化^[5];有学者关注赋权理论视角下“打工妹”的权益保护,认为打工妹应积极参与自身赋权,提升个人力量与自尊,才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6]。

以上学者关注对象仍是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有些学者则是关注相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如我国女性公务员心理失衡问题,并从赋权理论视角出发提供解决路径,认为应以外部分予和内部激化相结合的方式,从社会、人际、个体三层面面对女性公务员进行赋权^[7];有学者对女性经济赋权进行研究,总结了17个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发现实现“自我赋权”是赋权增能的关键^[8]。

另外,也有学者关注赋权视角下的女性行动。王真以“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女性行动为例,通过探讨赋权理论下的女性权利、分析街头运动,对该女性行动进行反思,认为赋权的目的是对抗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平等设置。为女性赋权是多向度

^[1]张欢欢,陶传进.“赋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S公益项目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0(03):161-168.

^[2]孙晓珍.社会工作赋权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女性素质提升[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23):230-231.

^[3]何堃,马永贞.妇女赋权:赋权理论分析社会工作案例[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08):6.

^[4]张家栋.赋权理论在单亲母亲群体中的运用[J].法制与社会,2017(19):291-292.

^[5]程玥.赋权理论下个案介入再婚妇女人际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

^[6]林婷婷.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之我见——基于赋权理论下的“打工妹”[J].青年与社会,2013(08):106.

^[7]蔡婉怡,刘圣中.赋权理论视角下我国女性公务员心理失衡问题的解决途径[J].领导科学,2017(30):49-51.

^[8]西爱琴,单浩耘,霍佳鑫,刘志燕.女性经济赋权:理论、实践与研究进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0,32(05):100-112.

的，即通过街头争权向网络赋权过渡，重视传统媒体的重要作用，以及推动出台保护性立法或制度^[1]。

随着国内的网络公共事件频发，国内学者们逐渐注意到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赋权现象，关于新媒体赋权的研究逐渐增多，徐智等通过分析网络女性自治区中的“女性嫌恶”问题，认为网络技术只提供女性主义发声的渠道，并不对其传播效果做出保证。互联网技术只是为女性制造了一场假象，可以一定程度上普及女性自主意识的知识、话语和观念，并不能真正使得女性团结一致和推动社会性别真正的发展。新媒体赋权表象下的女性性别意识仍处于“缺席”状态，当下性别话语深刻地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和技术权力的双重塑造^[2]。

有学者从技术、制度、内部三方面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女性赋权的困境。首先，技术与信息的获取是女性利用新媒体实现赋权的利器，然而互联网中的信息分化与数字鸿沟是女性发声的消音器。其次，父权制仍是女性解放的权力制约。最后，女性群体内部存在的性别歧视和双重标准仍然存在，阻碍女性实现自我赋权^[3]。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内赋权与性别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如何唤醒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促进个体进行自我赋权上。研究对象也多以农村地区女性为主，以城市女性为主和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为主体的研究较少，另外，在新媒体赋权领域，赋权对性别的帮助并不如想象中那样乐观。

1.2.2 赋权与网络自组织研究

有学者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分析了该群体如何自发利用QQ群、专业网站等手段建立起全国性等救治体系，如何以新兴的网络“自组织”为依托实现赋权。研究认为，自组织发展的历程也是普通公民主体意识发生、发展的过程，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政策和权力机构的缺失，为弱势群体提供赋权的机会^[4]。

目前国内以赋权理论视角对网络自组织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对象较为单一，该领域仍存在着空白等待补充。

^[1] 王真. 从街头到网络: 赋权理论视角下的女性权利倡导[D]. 华东理工大学, 2014.

^[2] 徐智, 高山. 网络女性自治区中的性别歧视内化——自媒体美妆视频中的女性嫌恶现象及批判[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06): 145-163.

^[3] 吕迪. 新媒体环境下女性赋权的问题与困境研究[J]. 科技传播, 2020, 12(17): 170-171.

^[4] 丁未. 新媒体赋权: 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J]. 开放时代, 2011(01): 124-145.

1.3 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问题

一场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捐助是如何吸引了大量的视线与声援，继而形成网络自组织并开展集体行动的？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本研究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作为个案，考察新冠疫情中的女性网络自组织如何借助社交平台发起和进行一项女性行动，并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

本文具体研究将围绕“女性网络自组织的赋权机制是如何生发的？”这一问题开展，此外，本研究将更深入的探讨：“在本土语境中，女性网络自组织是如何通过传播获得赋权？”、“赋权的过程和结果是怎样的？”

1.3.2 研究方法

“过程-事件”分析法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最早是1996年，由孙立平在进行土地改革口述史研究时提出的一个概念。“过程-事件”分析法是一种研究社会问题的分析方法，强调将静态的问题转化成若干个事件构成的动态过程，注重过程中各个因素对于事件所形成的影响。在过程-事件分析法中，过程是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过程-事件”分析法最开始运用于社会学研究，后逐渐被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融合应用。

本文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发生过程进行一个清晰的呈现，注重行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如孙立平教授所说，尽力将所要研究的对象从一个静态的结构转向成若干个事件构成的动态过程。

“过程-事件”分析法适用于“赋权”研究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二者都十分关注“情境”。“赋权”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如何通过自身觉醒实现自我赋能，强调关注“情境中的人”，而不是仅仅依靠专业人士的帮助。因此赋权领域学者莱帕波特提出了“情境分析法”，他认为情境、人物、时间是赋权中必须关注的三要素，即尽量采用历时性的研究方法，去关注人们赋权的感受以及赋权产生的条件。这与“过程-事件”分析法强调“情境”、“场景”，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建议不谋而合。

其次，两者都强调对“隐藏逻辑”的挖掘。如陆晔应用“过程-事件”方法分析“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之间的逻辑时，认为应将新闻生产过程视为一个社会过

程，一个权力如何实践自身的过程。他通过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层面的分析，理解和解释了新闻实践活动中具有不确定性的权力关系的深层逻辑，认为权力关系处于一个不断消解、建构，此消彼长的过程中^[1]。梅赫拉在讨论网络对边缘群体的赋权时，要求学者能尽量地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信息环境”中由价值观等要素组成的“关系”^[2]。这些隐藏在背后的“逻辑”往往在实践的过程中得以展现。

“过程-事件”分析法运用在文章的第三章中，笔者将研究对象分成分为三个阶段，从组织建立、组织架构、集体行动、观念定位方面，考察自组织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对其进行解读分析。

案例分析法

“过程-事件”分析法提供了一种指导性研究策略。有学者指出，要完成“过程-事件”分析中“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四个步骤，最适宜的研究方法就是深度个案研究，“因为它可以深入到现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3]，为深入开展赋权研究，解决研究问题，本文将采用案例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之一。

案例分析法主要运用在本文的第三章中。本研究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个案，因该行动的相关信息皆发布在@梁钰stacey个人微博中。因此笔者收集了从2020年2月7日该行动启动至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期间，行动发起人@梁钰stacey带有#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原创微博文本共计174条，并对其进行分析，尽量做到把握事件的重要信息，将资料的语言意义、社会文化意义、事件和空间背景以及叙述者表达意图等方面联系起来，揭示出事件具有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网络民族志

网络民族志的出现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网络空间为背景的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网络民族志作为继承民族志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于20世纪末引入到传播学研究中，受到新闻传播学者的

^[1] 陆晔. 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A].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信息化进程中的传媒教育与传媒研究--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汇编（上册）[C].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播学论坛,2002:9.

^[2] Mehra,B., Merkel, C., Bishop, A.P. The Internet for Empowerment of Minority and Marginalized Users.[J]. New Media & Society, 2004, 6(6):781-802.

^[3] 谢立中. 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2-31.

关注。网络民族志以网络田野作为研究场域，以线上社群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参与式观察的方式，研究分析网络中的文本、图像，思考现象背后真正的文化意义。

自2020年2月起，笔者在微博、微信平台见证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发起，及其在新冠疫情中如何得到响应和推广的过程，记录了该行动中出现的文字、图片、数据等资料，并撰写田野观察笔记。

1.4 概念界定

1.4.1 赋权

所谓赋权，在本研究中，赋权中的权力是一种社会学概念，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体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对外部环境和公共生活产生影响或者支配的能力。这里的社会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代集体。此处提到的资源不仅指金钱等有形资源，也指代能力、自尊感、信心感等无形资源。外在的“权力获取”可以使得赋权主体在内在精神层面产生一种“自我效能感”，自信心得到加强。赋权中的权力，其概念不同于平常使用的“权力”，兼有“权力”和“权利”双重含义，对于公共生活和个体生活产生影响的能力，可以理解为“权力”；而通过施加影响，个体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社会事务中，从而自我效能感得到提升，活得更有尊严，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的概念。

1.4.2 新媒体赋权

新媒体赋权指的是媒介成为权力实现的重要源泉与力量。它通过个体、群体、组织等获取信息、表达思想，从而为其采取行动、带来改变提供可能。新媒体赋权中强调多样化主体传播和权力等博弈，对具体主体而言，可能是增权，也可能是减权。

1.4.2 自组织

吴彤认为自组织是相对于被组织，是组织力来自事物内部的组织过程，包含着三类过程：一是由非组织到组织的过程演化，二是由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的过程演化，三是在相同组织层次上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演化。罗家德认为自组织是一个系统内部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本文研究对象是互联网中一个由大多数女性组成的志愿者团体，因此将自组织定义为：基于身份认同、情感性以及共同体利益维护基础上形成的女性自发、自愿、合作的一种自治组织形式。

2. 赋权理论基础概述

2.1 理论溯源

赋权概念引自西方，是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用语，从心理学的个体动机角度看，赋权是“赋能”（enabling）或是一种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它源自个体对自主的内在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赋能就是通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意识，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它是一个让个体感受到能自己控制的局面的过程。

Paulo Freire第一次将赋权概念理论化，他认为教育能够通过赋权行为，帮助受压迫的人民认识自身困难处境及原因，并主动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现状，实现自我解放。在不同的研究中，其适用的层面也有所不同。

2.2 理论要点

关于赋权的概念界定，西方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去阐释，并产生了一定共识。第一，‘赋权’中的‘权’指代的并不是法律层面的“权利”（Right），而是“权力”（Power）。Staples认为，赋权的重心是通过资源的提供、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个人能够从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这样他们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就会得到提高。Webster认为，赋权是‘给予权力或权威’；是指发展积极的自我能力意识，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性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可以增强个人和集体的资源，是和弱势群体有关的。Zimmerman等认为，赋权是个体能力、主动性提升带来的社会政策上的改变。并且认为赋权最好理解为一个开放的建构性研究，这个概念的界定要考虑必要的、特殊的背景。

其次，赋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赋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Zimmerman在其论文中详细描述了赋权在三个层次上的差异：第一个是发生在心理层面的赋权（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这一结构包括个人的控制力、对生活的主动性以及对社会政治环境的批判性理解；第二层次是组织赋权（Organization Empowerment），包括能够提高成员技巧，并为成员提供能影响社区变化的、相互帮助的过程和结构；第三个层次是社区赋权（Community Empowerment），是指在一个组织中的个体一起协作去提高集体生活，及其那些能帮助其保持生活质量的组织和机构。这三个层次互相影响，但个体赋权是基本目标。Zimmerman以“心理赋权”（PE）为例，专文介绍社区心理学在研究中如何区分赋权过程和结果，并从人内、

人际、行为三层面对PE的结果进行界定，继而发展出一套相对完善的分析框架和变量^[1]。

赋权理论在传播过程研究中应用广泛。罗杰斯和辛戈尔指出，赋权来自于群体间的相互沟通，从根本上看，可以把赋权理解为一个传播过程^[2]。

赋权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围绕着权力的再分配而展开的，1988年，学者罗兰斯在对赋权进行文献综述时，将权力分为四种含义：power over（掌控权）、power to（产生新的潜力）、power with（通过团体过程所产生的集体力量）、power from within（启迪、激活他者的精神力量）。

笔者以‘赋权’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中国知网”上得到194条结果，主要主题分布在新媒体赋权、社会质量、社区治理、网络民粹主义、精准扶贫、体育等方面。

国内关于赋权的研究成果以陈树强的《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为代表。陈树强通过梳理西方增权理论的相关著作，系统介绍了赋权的概念、理论来源、概念演变和与赋权相关的社会工作框架。深圳大学学者丁未（2009）通过梳理国外研究，发现赋权理论的三个天然取向：一，赋权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那些“无权”的群体，所以西方的赋权理论主要针对企业中的下属、少数群体、边缘群体、能力丧失者，即国内所说的‘弱势群体’。二，赋权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所以它与人类的基本传播行为有天然联系。三，赋权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而是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及其进程中^[3]。

随着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成熟，网络社会迅速发展。“赋权”理论因其帮助弱势群体进行自我效能提升、帮助促进社会公平的天然取向与新媒体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帮助消除数码鸿沟、推动女性发展等特点相结合，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颇为热门的术语。Amichai-Hamburge等人将新媒体赋权称为

“E-empowerment”，他们的论文集中讨论了互联网作为赋权的工具，是如何在不同层面实现赋权的过程的。他们建议赋权可以在四个阶段展开。第一，个人层面，

^[1] Zimmerman, M.A.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ssues and Illustr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5, 23(5):581-599

^[2] Rogers, E.M, Singhal, A.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J].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3, 27(1):67-85.

^[3]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76-81.

指重新塑造个性、提升内在的效率和技能；第二，人际层面，指社交补偿、高程度的自我揭示、减少刻板印象、鼓励跨文化对话等；第三，群体层面，指的是寻找同类、群体增强、群组决策的工具多样化、电子视觉和群组可视化等；第四，公民身份的层面，指政治参与、信息的可接近性、监督及影响政府的决策^[1]。

国内关于新媒体赋权的研究成果以师曾志《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郑永年的《技术赋权》、喻国明的“关系赋权”系列研究、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为代表。

师曾志认为，新媒体赋权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社会的媒介化，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解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二是媒介的社会化，它重构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郑永年基于“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中国语境下的新媒体赋权。他认为，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在特定的条件下，国家和社会力量能够相互赋权，而国家和社会之间力量的互动，其效果是能够为双方创造更多的权力。喻国明提出了“关系赋权”概念，他认为新媒体所创造的新的赋权方式本质上是关系赋权。关系赋权与过去的权力机制不同，它不依赖于任何外部的权力授予，而是来自于个体的自燃和群体的协同，是一种内生性的权力^[2]。

2.3 理论模型

Naila Kabeer将权力（power）定义为“能做出选择的能力”，被剥夺权力（disempowered）代表没有选择的能力。这样看来，赋权就是没有选择能力的人获得这种能力的过程。赋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能力从第t时刻到t+1时刻的改善就被认为是赋权。Naila Kabeer提出了赋权理论的基本模型，该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赋权理论模型由资源、能动性、成果三方面构成。资源是赋权的前提条件，指的是有利于赋权的各种有利条件。能动性指的是赋权过程，指能够定义自己的生活选择并追求自己目标的能力。成果是赋权的结果或产出（图2.1）。在这三者之中，能动性是赋权的核心^[3]。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女性网络自

^[1] Amichai-Hamburger Y, McKenna K Y A, Tal S A. E-empowerment: Empowerment by the Internet[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 24(5):1776-1789

^[2] 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6,38(10):6-27.

^[3] Naila Kabeer.Resources,Agency,Achievements: Re-f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 s Empowerment

组织的赋权机制是如何生发的，笔者认为，首先，有利于促进个体参与自组织活动的条件是资源。在此次行动中，互联网资源作为个体参与行动的前提，其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其次为教育资源，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中，志愿者们根据自身具备专业知识，进行了明确的组织分工，其专业性离不开教育资源的“在场”；集体行动与赋权成效是成果；最后，让个人具备选择并参与到自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动性是赋权的过程，也是本研究的重点。



图2.1 赋权理论模型

3.赋权理论视角下女性网络自组织行动分析

新冠疫情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全中国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已有3.2万余人，在湖北省抗疫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更是超过了10万人。上海市妇联从疫情前线获得的数据显示，战斗在一线的医生中有一半是女性，而女护士的数量更是超过了90%。上海市妇联等女性社会组织于1月31日发出募集安心裤等相关物资和资金的倡议书，所有募捐物品将捐赠给上海赴武汉医疗队女性工作人员，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疾控中心一线女性医务人员，以及市110个发热门诊一线女性医务人员。截至2月2日下午，考拉裤（裤型卫生巾）的募集总数达10.94万片，募集资金47.76万元。天猫平台上的爱心商家们和有库存的卫生巾生产商也发起了紧急捐赠。然而，与女性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女性用品（卫生巾、安心裤）的缺乏却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根据事件节点，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说明，并以此为基础从传播策略、赋权成效分析此次行动。

[J].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30 (1999),435-464.

3.1 阶段分析

3.1.1 第一阶段：行动发起与自组织的建立

“穿脱一套防护服至少耗费半小时，一丝都错不得。每次穿戴完后都要保持装备完整工作至少四小时，喝水、上厕所都不允许……”这是来自人民日报2月19日的一条防护服科普微博。在此之前，亦有穿脱防护服的相关信息收到人们关注，梁钰就是关注者之一。

作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发起人，梁钰在社交媒体话语空间中为性别议题发声多年。在关注到穿脱防护服不便的问题后，梁钰亦关注到了卫生巾这一经期必需用品和女性医务人员的生理期用品需求问题。2020年2月6日，梁钰在微博平台发博询问网友捐赠渠道，表示想要向女性医护人员捐助卫生巾与安心裤。2月7日00:24，梁钰再次发博，针对合法募捐事项询问网友。许多人都对梁钰捐赠卫生巾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很多网友在梁钰微博发表评论，也想帮助前线女性医护人员。因为涉及到合法性的问题，梁钰表示：“姐妹们，可能涉及法律问题，应该不会公开募集了，我可能就自己和朋友们捐了。如果有人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大家一起参与（@梁钰stacey，2020-02-07）。”2020年2月7日晚，梁钰正式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当天，她就收到了来自不同地方医护人员的私信：有黄冈某定点医院的医生为160名出不了隔离区的女性医护人员的求助；也有人代表支援方舱医院的朋友求安心裤^[1]。

在此之前，梁钰并不是微博大V，也并非公众人物。从梁钰的微博文本中可以看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发起，离不开女性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对女性群体的共情。“有些问题只有女人才能彼此感同身受……明明该说感谢的是我们吧，搞得我一时之间也有点哽咽。”（@梁钰stacey，2020-02-07）

这种“共情”与“认同”亦是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心理基础。除了梁钰以外，在此条微博的评论区内，也有女性互联网用户发声（图3.1），表示想要帮助前线女性医护人员。“还可以捐吗，我也想捐”、“身为女性，太知道经期的痛苦以及经期的需要了，想给抗疫工作做一点贡献”、“希望能早点有链接出来，

^[1] 2月18日北京青年报（北京头条 app）湖北部分女性医护人员紧缺卫生用品 志愿者发动募捐筹集物资 <https://app.bjtitle.com/8816/newshow.php?newsid=5549433&src=stream&typeid=5&uid=276908&did=317c253542a04be096ff573eb83f273a&show=0&fSize=M&ver=2.6.7&ff=fz&mood=wx&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姐妹们一起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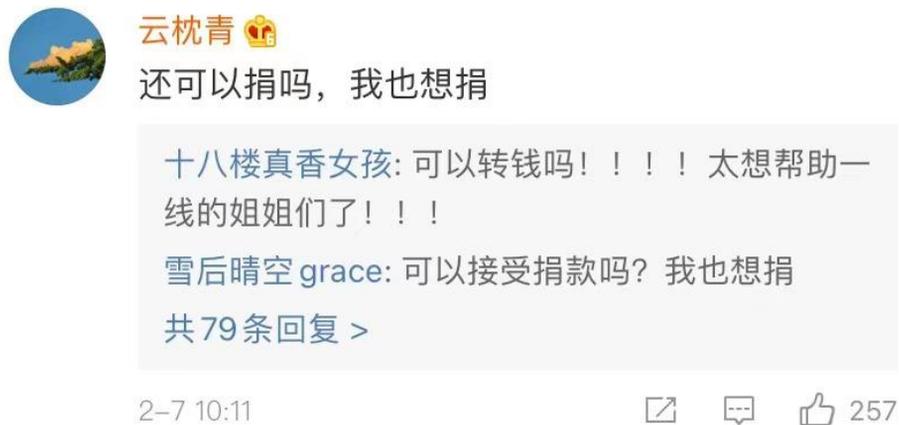


图 3.1 其他微博用户发声

以此条回复为例，笔者经过调查发现，79条回复来自于不同的女性微博用户（注：微博资料性别为女）。邹英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认为自己是某个群体成员以及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终依靠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从以“姐妹”命名的公益活动，到“太想帮助一线的姐姐们了”的回复，不难看出梁钰等人对于女性群体间的“姐妹情谊”存在高度的认同感。姐妹情谊（sisterhood）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实践中是维持女性之间政治团结（political solidarity）的基础，尤其是当女性被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层特权等分割时，姐妹情谊能够“唤醒共同被压迫（common oppression）的感觉”（hooks, 1986）^[1]。然而在本土数字空间中，“姐妹情谊”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性而非政治性的话语、行动召唤，即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女性互助与团结（冯剑侠，2020）^[2]。“‘姐妹’这个词真的很有力量。而它之所以有力，正是因为这种共情是广泛而真实的。我们感受到另一个女性的需要和她们的痛苦，并感到这跟自己休戚相关。”（@梁钰stacey, 2020-03-28）共情像是一滴滴入平静湖面的水，扩散出的涟漪能够将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使情绪得到传播同时，将事件也广泛传播。可以看出，“共情”在促成行动开展以及扩大号召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梁钰发起捐赠安心裤活动之前，她没有参与或组织过其他的志愿活动、捐款活动或捐物资活动（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纪实报道，2020）。最开始梁钰在微博上简单列出了姐妹安心战疫行动志愿者人员的招募信息：总数5~7人，其中对接组2~3名，信息组1~2名，媒体组1名（@梁钰stacey, 2020-02-14）。从梁钰提出的要求

^[1]hooks, B. (1986). Sisterhood: Political solidarity between women. *Feminist Review*, 23(1), 125-138.

^[2]冯剑侠.#看见女性劳动者#: 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与话语行动主义[J].新闻记者,2020(10):32-44.

中可以看出，行动对志愿者人员的招募有明确需求，对其专业性也有着基本要求。根据Naila Kabeer提出的赋权基本模型，能够看出自组织的组建和扩大离不开两种资源：教育资源与技术资源。教育资源为个体掌握的专业知识资源，即个体能够熟练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行动的能力；技术资源为互联网资源，即个体能够接触网络并使用网络的能力。二者构成了此次赋权的前提条件。

3.1.2 第二阶段：专业的集体行动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由梁钰发起并进行志愿者组织统筹工作，志愿者组织分为两大部门，物资流转部门和信息职能部门，而后又各自分组，共九组，分别是募捐组（对接基金会、确定捐赠方案确保实施、对接其他捐赠机构）、物资组（协调供应商物资，匹配医院需求）、物流组（联络、协调物流资源，保证物资配送）、对接组（医院需求收集与核实、物资对接与最终落地）、信息组（整理、汇总、核实信息）、公示组（招募宣传、项目公示）、科普组（科普、团队故事采访、公关文案）、媒体组（媒体合作采访对接）和综合职能组（人事、法务、保险）。小组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志愿者组织通过微博招募志愿者、获取医护人员的需求与反馈、用私信接收志愿者简历。“我们会按照不同专业进行职能分工，拉到不同的微信群里一起工作。群组内部和群组之间定期开会，人少就在微信群里，人多就用钉钉。所有文件和数据都通过石墨文档在线共享。”（冯剑侠，2020）

明确的组织结构有利于自组织推进行动进度，在进行统筹安排时，梁钰表示，各组组长之间实行交接制度，以缓解成员因复工带来的工作超负荷状态（纪实报道，2020）。

自我赋权是一个从少权到增权的过程。自我赋权不是主动、天然地赋予个体权力，而是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力的自觉与提升，掌握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技巧及亲身参与促进改变的运动。在自我赋权的概念中，除了行为、态度以及行动的赋权以外，还有心理上的、能力上的“赋权”，在志愿者团队内，梁钰和其他志愿者都在行动中表现出对个体的赋权，即发展了一个更加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都认为要尽快行动才能为前线的女性医护工作者提供帮助，“大家都很主动积极…我们是真的纯靠自觉啊”（纪实报道，2020）。

该行动最大的赋权功能体现在集体行动中，根据Naila Kabeer的赋权理论模型，笔者认为，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并展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代表着自我赋权的过程，也

是实现群体赋权的前提。在新冠疫情爆发和女性医护人员基数庞大的背景下，志愿者团队的行动强调高效性与时效性，去协调企业、捐赠者与医院三方的需求。

(1) 联系企业

从2月6日梁钰微博发问，到2月11日梁钰团队和灵山基金会合作的公募链接上线，上线一天多就募捐超200余万元。顺利募捐的背后离不开企业力量，而选择合适的品牌方，就是志愿者团队要做的第一步。参与联系企业的过程主要由梁钰本人、物资组和对接组执行，除此之外还有负责协调各方需求的其他组别。在工厂无法开工的背景下，团队可选择的范围很小，以“厂家有三证、仓库在湖北、仓库有货”为出发点，在过程方面，志愿者团队要自己的考量，以“高效，快”为重点，总结出三项工作流程（图3.2），一是确定可供货的厂家，摸清品类；二是与企业进行价格协商；三是协调匹配三方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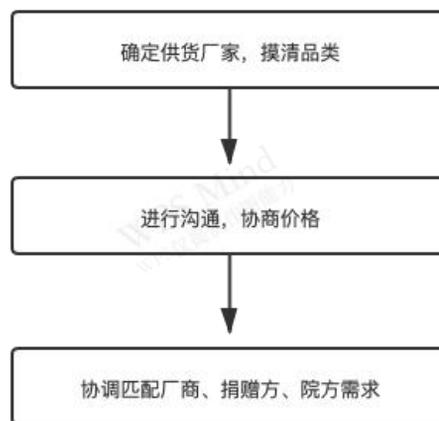


图 3.2 三项工作流程

(2) 联系捐赠者

在了解粉丝以及后援会的募捐方法不适用于本次公益活动后，志愿者团队将募捐分为四个板块：协调捐赠、平台公募、团队捐物、定向捐赠。

协调捐赠于公募前开展，由社会团体或个人购买物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协助匹配和运输至医院。平台公募是由公众将款项捐给无锡灵山慈善组织，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使用所筹善款购买物资，匹配、运输至医院。团队捐物是由社会团体自行购买物资后，将物资捐赠至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将物资匹配至医院并协助进行运输；定向捐赠于公募后开展，为满足公募后剩余的少量需求，由社会团体或个人捐赠款项，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购买物资并运输至需求医院。（@梁钰stacey，2020-2-23）

在面向公众公众进行募捐之后，志愿者团队发现如何引起更多爱心人士或团体的注意已经上升到了意识问题的高度，其中包括下面这些问题，“如何让更多的人对女性医护者的巨大困境和需求感同身受”，“如何引导公众主动发现问题而不是机械地被引导”。志愿者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尝试了反向引导发现的方法。在发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达到足够好的效果之后，其团队将已有意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集中，通过微博宣传引导他们集中进行募捐，这样的做法无疑收获了更好的效果。这一部分主要由梁钰、募捐组信息组负责。

(3) 联系医院

与医院的沟通主要由团队中的对接组和物资组负责。团队于医院依靠微博平台取得联系。一方面是团队发微博宣传，等待有需要的医护人员找到她们。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渠道主动联系。通过熟人介绍，对接组的志愿者进入一个由孝感各医院一线医护组成的微信群，每天询问、整理她们的需求，再将信息返送给梁钰，由梁钰联络捐赠和物流，同时，梁钰也从卫健委网站查询信息，给湖北的几家医院打电话，询问他们的需求^[1]。

接到医院的需求后，团队会对信息进行及时的统计与核实。近十位志愿者会一起制作并更新一张详尽的表格（囊括了医院地址、医护数目、对接人信息、安心裤尺码等信息），在核实后，再与捐赠方的物资进行对接匹配^[2]。

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个体的能动性和行动的能力。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志愿者团队的人数也逐渐上升。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在组建志愿者团队后，共进行过两次志愿者招募。梁钰指出她“招人的时候基本上会比较看重他的专业性，相当于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里再一次体现出教育资源的必要性。梁钰在筛选组员强调专业性的前提，恰恰是他们后期得以如此高效处理数据和问题的保障。如果说在梁钰和其他志愿者们在线上工作中，依靠提升内在效率，展现积极的自我意识，得到自我赋权。那么在群体赋权阶段，志愿者作为赋权主体，随着无序的个人逐渐向有组织、有规模的群体靠拢时，群体对外辐射的能力逐步增强，能借助的外力逐渐增多，在网络空间也掌握更多话语权。

群体赋权构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它相对疏离于社会原有权力结构关系，是社

^[1] 《莓辣 MAYLOVE 这项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需求，终于有人想到了！》

https://mp.weixin.qq.com/s/wG5Livzs_gY12LW2ZJsig

^[2] 《Woman initiates menstrual hygiene item donation for female medical staffers》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79249.shtml>

会连接、整合和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很多的空间想象和救赎都是在群体赋权中展开的。从志愿者团体的集体行动效能来看。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延续了最初的组别分工模式，并对部门职能加以更详细的划分，确保了即使面对大量的讯息与物资，团队也能够进行高效处理。西方学者古铁雷斯 (Gutiérrez) 等人认为“赋权把助人关系建立在合作信任和分享权力基础之上”^[1]。该志愿者团队建立在“姐妹情谊”的感性动机和“帮助女性医护人员”的理性动机上，发起者梁钰对专业精神的注重和对组织内分工的建构明确。通过进行集体行动，个体被更强地组织了起来，自我效能感得到进一步提升。行动的推进难免出错，而志愿者对于错误的积极承认，推动了组织内部的合作信任关系加深。“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只是希望这件事能做成，想看看我能做什么帮助它做成，说不上信任不信任。但从这次勘误，信任开始建立起来了。我信任一个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组织。”青鸟说。这件事，是她信任“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起点 (@梁钰stacey, 2020-03-28)。

3.1.3 第三阶段：相关活动的展开

随着公募采购的物品全部抵达一线，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队决定不再公开募捐。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募捐行动以外，该网络自组织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有了愈来愈多的关联——发起以女性生理期为主题的相关活动。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一期结束后，2020年3月8日的三八妇女节，梁钰在微博发起卫生巾合影活动，邀请网友一起和卫生巾合影，“用行动支援姐妹们！”该微博配图九张，并且在明显位置展示了三句标语，分别是“打破羞耻”、“声援姐妹”、“安心行动”。笔者也参与了此活动，并记录相关感受。

因为一直在关注梁钰，所以这个活动一上线，我就在首页刷到了。说实话，与卫生巾合影并没有让我觉得害羞，反而有一种激动感，这种激动源于在评论区看到了许多人参与其中，既有女性也有男性。大家互相夸赞、鼓励，让我觉得女性间的团结是如此令人感动，姐妹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活动对我产生了一种激励作用，让我产生‘也想为别人做点什么’的冲动。（田野观察笔记，2020-03-08）

可以看出，卫生巾合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人加强了对自身的身份认同，

^[1] L.M.Gutiérrez, K. A. Delois & L.Glenmayer, “Understanding Empowerment Practice: Building on Practitioner Based Knowledge,”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November 1995, 转引自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

在心理上增强了个人层面的赋能。同天，梁钰还发布了一组月经科普漫画，并配文“月经不是羞耻，反而月经代表着女性身体的伟大……我们的身体一直生生不息在前进，我们的人生也可以，就像在战疫一线闪闪发光的女性劳动者一样！让我们一起正视月经，接纳月经，希望终有一天每一个姐妹都能不再受生理用品短缺和痛经的困扰，能大大方方拿着卫生巾走出便利店。也愿我们都能为我们自己生而为女感到自豪和骄傲！”（@梁钰stacey, 2020-03-08）

相关活动的开展使引发本次行动的根源性问题浮出水面，即思想层面上的“月经羞耻”。全球妇女权利慈善机构英国国际计划组织曾公布调查数据，在英国，有14%的女孩面对第一次月经不知道这是什么，26%的女孩不知道该如何去做，48%的女孩因为月经而感到尴尬，49%的女孩因为痛经不得不缺课一天。《说文解字》中解释月经时说，妇人来月经时，不能进入产房，也不可以参与祭祀。在各种宗教、习俗规定下，月经一方面笼罩着神秘色彩，一方面又被人们厌恶。认为月经是“不洁”的事情。有调查显示，在180个国家中，对于“月经”的隐晦称呼超过5000种。2020年2月17日，央视播放的女护士采访中，提到了生理期不便，随后重播时，“生理期”三个字被删除。可以看出，月经羞耻仍在我国目前思想文化中占有较大比重。

事实上，随着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开展，梁钰多次呼吁将卫生巾、安心裤等女性生理用品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中，且号召网友在发改委网站妥善、合理的发表意见。“捐赠安心裤（裤型卫生巾）不应该是我在劳心劳力，也不该是任何社会组织慈善基金，甚至不应该是妇联。这本来就是应该划进【战时状态】的统一采购分派的必需物资，个人和其他机构的能力太有限了。”（@梁钰stacey, 2020-02-10）

大众媒体对这个自发的网络自组织多有报道，其中也不乏对“月经羞耻”思想的批判。平时通过暗号、密语尚且可以低调解决刚需，但在疫情这种突发事件中，这一女性生理需求困境才得到了应有的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队的发声，可以看成是女性对自身生理需求掌控权的一种呼吁，以及对女性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的维护。

3.2 传播策略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等人在《赋权与传播：来自社会变革的组织经验》一文中，明确地将赋权视为“一种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来自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他认为，交流使赋权得以实现，当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对话”（如沟通、辩论、反馈等）时，赋权的效果更为显著。对话是赋权过程的基本构成，个体通过与同伴的对话而获得信念；同时，他们强调小团体内的对话可以产生彼此的认同感和掌握自己的生活、促成社会变革的力量感^[1]由此可见，个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得到赋权。

赋权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传播。个体要实现赋权、提高自身的权能就要积极的和外界进行沟通交流。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例，无论是志愿者团体内部的沟通对话，还是对外的信息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实现了赋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在去中心化、开放、共享的理念下，传播活动既包括由传播者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过程，也包括受众将自身创造的信息传播给其他受众的过程。受众的概念被重塑，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主动选择信息的消费者和新信息的生产者。基于此，一个受众如果通过发布信息获得大量其他受众的关注认可，那么这个受众便从普通个体进一步变为意见领袖，可以看出，个体通过技术赋权，在发声过程中，能够让分散的人员聚集起来，使信息得到更有效的传播，进一步增强自身话语权和群体成员的心理赋能。

有效的传播离不开策略，在网络空间中，面对海量的信息，传播策略既是有效传播的基础，也是推动赋权发生的必要条件。笔者尝试从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分析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队的传播策略。

3.2.1 传播内容全面而客观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是梁钰在新浪微博平台发起的一项公益行动，以支援战疫前线女性医护人员、回应她们的现实需求、保护她们的生理健康为行动目的，后续的传播活动也由此展开。笔者根据对梁钰带有#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话题标签的原创微博分析，将其分为五类（图3.3）。分别是行动公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资料公示及

^[1] E. M. Rogers & A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医院接收物资公示，共74条）、交流截图（志愿者团队与医护人员交流后心得体会，共21条）、相关信息（包含志愿者相关故事、媒体报道、与医护人员合影信息等，共60条）、相关活动（共5条）、呼吁（带有呼吁意味的微博，以将女性生理用品纳入抗疫物资和希望媒体能够更多关注女性医护人员，共14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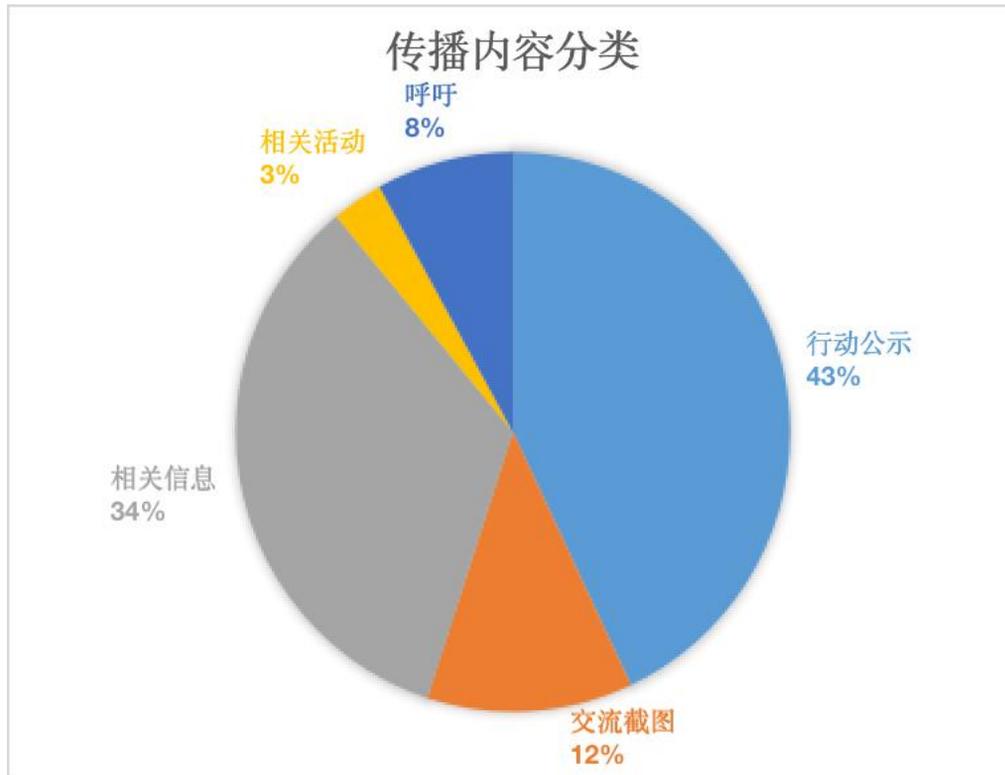


图 3.3 传播内容分类

从整体传播内容来看，行动公示占总相关微博43%。作为公益行动组织，资料的公开透明是确保公众信任和进行募捐活动的基础。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公示自2月9日起，终于3月21日，每日都会对前一日的行动进行总结公示，公开钱款去向、募捐者/组织明细，并在结尾处进行总结。自组织会同时制作每日公示的SOP（标准程序作业），内容围绕受捐赠医院地图、定向捐赠进度、捐赠对接项目小结三方面展开，在视觉上看更加清晰直观，方便公众了解项目进程。

其次，与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有关的相关信息也常常出现在传播内容中，占34%。相关内容以发布团队志愿者个人故事、分享媒体对自组织的采访报道为主。正能量是加强和完善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是个人和社会积极力量的重要来源^[1]。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讲述志愿者的事迹，在传递正能量的同时，也能够加深受众对于该自组织的认同感。而经过筛选分享的媒体专业报道，从侧面也反映出知名媒体对自

^[1] 刘紫君. 社交网络用户正能量信息感知价值与接受行为和正向行为改变的关系影响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9.

组织集体行动的一种肯定，能够稳定受众对自组织的正面印象。

然而，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并不是只进行单一的正能量传播。另一方面，梁钰也会发布与医护人员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分为两类，一类是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发来的境况和求助信息，另一类是女性医护人员发来的感谢。求助信息截图大部分发布于行动初期，搭配的文本一般带有负面情绪，如愤怒、难过等。截图作为一种常见的将设备屏幕上内容的精确复制的技术，已经成为了数字化媒介交流中的日常环节。有研究者对青少年圈子中的截图现象进行研究，认为截图在青少年朋友圈子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被比作“建立网络、群体思想和联盟的重要资源”（Skovholt & Svennecig, 2006）^[1]。在梁钰的传播内容中，截图可以作为“证据”，以准确的展示出女性医护人员目前的处境以及面对的困境。并且可以用来证明自己（梁钰）所言为真。与此同时，梁钰在分享与医护人员的聊天截图时，也遵守了道德规范，将对方用户名、姓名、和头像进行马赛克处理，保护了个人的隐私。

3.2.2 传播形式丰富而多样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构建在网络空间中，因此其传播形式均依靠网络传播。笔者将其传播形式分为主题标签、媒体采访、明星榜样、H5互动四种类型。

通过分析发现，该自组织选择在传播形式上以主题标签#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主。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及其允许用户生成内容等特征，以及主题标签的聚合和对话功能，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声”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更具有包容性的选择，建立起一个可见的、但又不会脱离一般公共领域的女性主义话语空间^[2]。梁钰在每一条与行动有关的博文中，都会带上这条主题标签。另一方面，所有带有这个标签的博文都会被微博统一收录。主题标签能够帮助受众更加直接、清晰的获取行动相关信息。

其次，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队与主流媒体展开对话。主流媒体通过对行动发起人梁钰和其他志愿者进行采访报道，挖掘更详细的工作流程和团队故事，并将报道发布在其主体网络账号上（图3.4），使自组织得到大量曝光。以正能量为主旋律的报道和主流媒体的背书，有助于稳固自组织积极、正面的形象，帮助其开展相关公益活动和后续行动。

^[1] Skovholt, K, Svennecig, J (2006) Email copies in workplace interac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1): 42 - 65.

^[2] Huang, Y.L.(2016). War on women: Interlocking conflicts within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5), 1-19.



图 3.4 三联生活周刊发布对@梁钰 stacey 的语音采访。获得一万余次“点赞”

同时，自组织通过树立明星榜样，宣传明星参与该行动的相关事迹，以扩大影响力。2月24日，梁钰在微博中感谢艺人王菊，“……菊姐从很早就联系我们了，并且采购物流都亲力亲为……其实，菊姐可以自己捐的啊，没有必要加入姐妹们一起。但菊姐说希望加入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姐妹们的需求，关注到一线女性医护工作者的需求”（@梁钰stacey，2020-02-24），此条微博得到26173次“转发”和54296次“点赞”。自组织在与明星合作发声的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明星粉丝群体和路人网友的关注，来自明星粉丝群体的捐赠数额占团队捐赠总数的6%。

最后，自组织通过H5页面与受众进行互动。H5又称互动H5，是指在智能手机可以播放Flash的移动端上呈现的，可以达到Flash效果（如各种动画，互动）网页，一般用于广告、营销等途径。受众通过自组织开发的H5页面，参与二期募捐和卫生巾合影活动。H5页面不是绝对性的“点开即完成”，它需要受众参与其中，在受众积极、自愿的情绪前提下，才能完整的完成互动。

3.2.3 传播效果积极而有效

传播效果是指对人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按照其发生的逻辑顺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即作用于个体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情感层面，即作用于因个体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行动层面即作用于个体的言行而引起的行为上的变化。

传播效果的第一层面是认知层面，即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是否会引起个体知识量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因自组织在传播过程中选择使用话题标签的形式，做到了信息的有效统一，在广泛宣传行动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受众反馈，受众发表带有此话题标签的博文，也会收录进该话题社区。要判断受众是否对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具有一定认知，新浪微博对主题标签“阅读量”和“讨论数”的呈现是最显性的评估指标。截止2020年12月，该主题标签共获得5.2亿阅读量和54.7万次讨论。

传播效果的第二层面是情感层面，即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是否引起人们情绪或感情的变化。网络由于其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个体在网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由于网络存在匿名性和虚拟性，这些都会导致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感和控制力降低，使得会出现情绪失控、态度表达偏激或有攻击行为等情况。在梁钰的带有截图的传播内容中，抗疫一线的紧张情况和医护人员真实的困境容易调动起受众的情绪，群体情绪是催生网络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其中，群体愤怒又是群体情绪中最易产生的情绪，群体愤怒是指个体针对特定事件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产生的情绪，群体情绪的主要特征就是个体对于自身没有任何影响，但对群体有所影响的事件所产生强烈情绪反应。情绪的产生促使受众自发进行传播，并对事件报以持续关注，踊跃发言，变成梁钰微博的“铁粉”^[1]。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传播效果在情感层面实现了对受众情绪的调动，通过唤醒受众情绪，使行动得了关于与传播。

传播效果的第三层面是行动层面，即姐妹战疫安心行动是否能够引起人们在行为上的改变。该行动发起于线上微博平台，公共平台便于笔者观察其互动机制，在该行动中，这种互动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加入志愿者、进行分享讨论、积极参与捐款。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在发起与进行的过程中，皆与社交平台建立起强烈的关联。由于该自组织并不是成立即完备的，随着行动的推进，梁钰又通过发布微博进行了两次志愿者招募，并使用微博私信接收用户简历，进行筛选。此外，受众会对梁钰微博内与行动相关的内容进行转发、评论，并且会积极参与公开募捐活动，第一期公开募捐活动从上线到达到预期金额，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因为捐款有总额度限制，许多用户抱怨“捐不上”，梁钰在进行第二期公开募捐时，发表微博与受众进行互动：“大家太过于踊跃了，为了能二期让大家都能尽份力，不如二期捐款设置个人

^[1] 铁粉是微博推出的反映粉丝与博主之间亲密度的互动产品。近30天内对已关注的博主互动达到5天及以上才可获得“铁粉”标志。

捐款上限如何？一人最多捐50的那种？”（@梁钰stacey，2020-02-28）。笔者通过观察能够看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传播效果在行动层面有效实现了刺激互动参与的意图。

3.3 赋权成效

根据Naïla Kabeer的赋权理论模型，对赋权结果的探讨，要从赋权的成效入手。个体得到赋权并进行行动之后，是否获得了社会资本、帮助其提升权能和对当下对权力结构有所影响，实现了从t时刻到t+1时刻的过程？笔者尝试从两方面对其成效进行分析。第一方面是表层效应，即赋权个体进行行动后所得到的直接结果分析；第二方面是深层效应，即关注赋权个体进行行动后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3.3.1 表层效应：物资保障到位，社会活动开展

(1) 公民层面：为女性医护提供生理事物保障

随着传播活动的进行，自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加入的个体代表着自组织能够借助的外力随之增多，其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也持续增加。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Robert Putnam，1993）^[1]，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两者关系密不可分^[2]。在自组织发展过程中，出于对“姐妹情谊”的认同感，“姐妹”一词在自组织中成为带有强烈归属感的话语符号，志愿者们凭借认同感与共同体意识，在网络空间建立联系，构成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遵守分组规范进行集体行动。在志愿者团队的努力推动下，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共帮助了205家（支）医疗队，为超84500名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健康提供物资保障。

(2) 社会层面：后续相关活动开展

自组织的行动在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提供帮助的同时，其传递出的想法不仅是为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向大众传达观念，即打破月经羞耻，正视女性的生理需要。社会观念的改善有利于从下至上影响政府决策，推动政府出台新政策、新制度提高女性福祉，保障女性权利。在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结束后，自组织发起人梁钰又组织了卫生巾互助盒行动，旨在打破月经羞耻，鼓励女性互助。该事件起源

^[1] Robert Putnam,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黄锐. 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7(06):84-91.

于某微博用户看到梁钰发布的捐赠卫生巾微博后，受到启发自发在教室提供卫生巾互助盒，帮助其他忘带卫生巾的女性。梁钰将这件事整理发布后，该行动获得了更多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互助盒设置的地点不在女厕内部，而是在男女厕之间的公共空间，以提高月经可见度。在民间自发设置和高校官方介入的情况下，据资料显示，共有400余所学校响应该行动，话题标签#卫生巾互助盒#也登上微博热门搜索界面，获得了2.2亿次阅读。

在#散装卫生巾#登上微博热搜后，相关内容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讨论让“月经贫困”这一长期不被公众注意的女性困境登上舆论中心。月经贫困指的是受文化观念和经济观念的制约，女性无法在生理期获得所需的卫生产品。月经贫困并不局限于贫困地区，即使在人均收入较高的英国，也有15%的女性（14-21岁）曾买不起经期用品，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有超过50%的女性选择自制经期卫生用品，自制替代品几乎不可能达到卫生标准，这种贫困造成的健康问题又进一步损害了女性的劳动能力。月经贫困的背后，反映出的不只是个体生理知识的匮乏和被压抑的身体表达，还有被剥夺的经济权利。父权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使得许多女性的收入赋权的是家庭而不是女性个体。梁钰与自组织成员在注意到国内“月经贫困”现象后，继而发起月经安心行动，旨在关注国内处于贫困地区、贫困状态的未成年女性的月经贫困现象，为她们送去经期用品。在此期间，卫生巾的高增值税问题也进入公众视线，受到大量讨论。

进行社会活动以保障女性权利是自组织开展相关行动的目的。单靠聚焦于问题产生的制度漏洞，对当下处于“月经贫困”中的女性而言，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自组织在线下社会公益活动帮助女性赋权的同时，依靠新媒介进行发声、宣传，有利于聚焦公众和媒体的视线，为月经祛魅，推动政策的改变与落实。

3.3.2 深层效应：改善刻板印象，推动政策出台

(1) 思想层面：改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最初专指印刷铅板，它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进入到传播学领域，始于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学》。李普曼认为，“人们往往在观察某个事物之前，就用头脑中对这一类事物的认知模式来解释来眼前某个事物，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这种成见，就很难摆脱它。”笔者经过归纳认为，刻板印象首先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认知模式，它是人们对社会中的特定群体或行为的特征、属性等固定化的认识，

这种认识中通常包含着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评价，它在社会互动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以及群体成员的行为反应。经过笔者整理，发现与女性有关的刻板印象主要来源于历史文化影响、女性自身观念影响、市场经济影响和媒介呈现四种因素。

其中，媒介呈现对刻板印象的产生具有极大影响，广告、新闻、信息的传播，无一不依靠媒介。在传播内容中，女性被塑造为“贤妻良母”、“女强人”、“剩女”的形象，也经常以“母亲”、“妻子”的身份出现。@中国妇女报在对疫情中女性劳动者进行赞扬时，也仍受刻板印象影响：“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她们是熠熠闪光的女性”。针对这样的表述，微博用户“猫猫喵的么么哒”说：“她们是熠熠闪光的女性，请不要用女儿、妻子、母亲这些称呼！表扬男性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儿子、丈夫、父亲？请一视同仁！记住保家卫国挺身奋战的她们！”

为改善刻板印象，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体在进行自组织LOGO设计和宣传长条图片的制作时，在配色和字体的选择上，也回避了“粉色”与“圆圆的字体”这种强调女性性别差异的因素，而是选择了蓝色和棱角分明的字体，除此之外，还多次对引用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自媒体喊话，抵制对女性“柔弱可爱”刻板印象的呈现：“麻烦你们排版能不能不要用粉色，也不要那种圆圆软软的字体。她们的战斗装备都是蓝色，我们的宣传海报也是蓝色。我们从头到尾的宣发，想传达的都是女性劳动者的力量、坚韧、精气神！”（@梁钰stacey，2020-02-20）。

9月15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第四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涟漪效应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年来取得的进展陷入停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五项是“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女童赋权”，然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加剧了不平等，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在全球范围内，无偿护理工作整体需求的增加导致女性面临更多负担，女性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公共灾难、经济困难时期往往会招至保守主义回魂，放大性别不平等^[1]。在此背景下，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发起，使主流媒体和公众关注到女性劳动者显而易见的不可见——生理困境，完成了从“失语”向“发声”的转变，进一步促进女性医护人员以及一线的女性劳动者的存在能够被“看见”。在行动的过程中，自组织既实现了群体赋权，又作为“外力”，向社会中限制女性的刻板印象和传统惯习发起挑战，对女性劳动者群体进行增权。

^[1] 界面文化，不再沉默的女性 | 2020年性别新闻盘点：<https://mp.weixin.qq.com/s/9QQZiv0Dmj9JDSm7MUos9eA>

(2) 制度层面：推动公共政策发展

从传播内容分析中能够发现，在行动进行的过程中，梁钰曾多次呼吁将女性生理卫生用品纳入防疫必需品。而自组织与主流媒体的沟通，也让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解放日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澎湃新闻、凤凰卫视、CGTN等主流媒体的采访报道，疫情期间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需求困境得到公众关注，并推动“女性生理卫生用品纳入防疫保障用品清单”成为政策议题（全国妇联，2020-03-08）。

另一方面，自组织在后续活动中发现，安心裤、卫生巾仍然不能够进入防疫物流绿色通道。新版《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更新的保障物资清单中，也没有女性生理卫生用品。面对这种情况，自组织仍然在努力为女性医护人员争取权利，并使用微博号召用户去国家发改委网站留言，妥善合理地表达诉求。赋权中的“权能”不仅包括个人事务上的技能，还包括获取、质疑、筛选信息的能力、反思的能力、参与行动的能力以及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调整能力^[1]。在行动中，赋权个体对筛选后的信息提出质疑，并向政府机构进行反馈，在参与促进公共政策改变并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其公民身份层面的“权能”。

3.4 本章小结

通过对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该网络自组织在组建到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其参与者必须拥有两种资源：教育资源（专业能力）与技术资源（互联网）。该自组织的赋权在活动的推进中逐步实现，从个人（心理）层面看，自组织的建立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赋权主体自我意识的提升和积极的内在驱动力。从群体（集体行动）层面看，依托于清晰的组织分工与群体信任的集体行动，使得自组织向外的辐射能力加强。志愿者团队内部分工体系的建构和相关行动的开展，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转移和重构。笔者从大众媒体对该行动的多篇报道中发现，梁钰作为该行动的发起者、领导者，在活动影响扩大后，她的增权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该行动中的核心志愿者在媒体采访与传播中也同样获得一定的增权。

根据学者罗兰斯对赋权中四种权力的理解，笔者尝试从横向来分析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体通过群体赋权所获取的基本权力。首先，在自组织的建设和运作

^[1] 梁辰曦.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研究[D].重庆大学,2019.

过程中，志愿者作为赋权主体能够有效地参与该行动相关的决策、实施、管理的全过程，从而获得决策中的权力，即罗杰斯所说的‘掌控权’。高效的集体行动有利于集体信任的加深，能够使赋权主体感受到通过团体过程所产生的集体力量。同时，随着自组织成员的认同感不断加深，建立于感性动机上的链接也愈发紧密，从而获得启迪、激活他者的精神力量。

从纵向上来看，在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中，群体的赋权不断加强，并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自组织的高效合作模式受到公众重视和学习、参与多样女性议题讨论、发起新型线下活动等。总的来说，以“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健康提供物资保障”为目标指向而自发建立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团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政府政策的“倒逼”，以期望于未来政策能够确保保障妇女基本权益。

通过对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该自组织传播目的明确、传播内容多样、传播形式灵活、传播效果明显。

从纵向上看，作为公益项目自组织，少有的详细行动公示值得同类自组织进行学习。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组织提高权威性，也可以提升受众对其的信任。权威性的提高有助于组织更加顺利的开展集体行动，实现群体赋权。从横向上看，灵活的传播形式有利于自组织扩大知名度，得到外界关注，方便自组织借助外力实现赋权。

最后，笔者从表层效应与深层效应两方面出发，对行动的赋权成效进行探讨。自组织通过技术赋权和群体赋权，获得社会资本，在公民层面维护了女性医护人员身体权益。此外，在行动的舆论影响下，相关政策议题也被提出。尽管政策未得到及时的落实，自组织发动公民行使权能，推动政策的发展与落实。在思想层面上，在以父权思想为主流思想的前提下，自组织以改善刻板印象为出发点，进行宣传与发布，反映出对于父权思想的挑战。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年，“月经贫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社会层面上，后续开展的相关行动有利于推动社会打破“月经羞耻”思想、使公众、媒体关注当下国内贫困地区女性的“月经贫困”问题，为精准扶贫提供帮助，并作为“外力”对贫困地区的女性赋权。

4. 赋权理论视角下女性网络自组织发展困境

4.1 平台方面：信息操控，影响传播效果

网络自组织建立于网络空间，其发声、行动皆依托内容平台进行开展。内容平台由公司持有并进行管理，平台用户发布的信息皆要经过公司审核。不同平台价值观、审核机制也有所区别。一方面，在新浪微博，平台能够通过算法或人工行为影响一条微博内容的浏览量和推送量，也就是所谓的“限流^[1]”。浏览量与推送量减少意味着用户能够得到新信息的概率降低，用户处于信息茧房当中，缺乏对其他领域的接触与认识，将用户禁锢在有限的领域内，会限制用户对社会的全面认识^[2]，且对自组织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也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平台期望用户发布的内容能够得到关注，为平台带来“流量”，在此前提下，也会对用户内容、公共议题进行操纵，让公众注意力转移，导致真正的社会问题不能获得公众的持续关注与讨论，平台的强自主性会导致“伪公共性”对真正公共事务空间的挤占。内容标签#拒绝月经羞耻#经由大量用户讨论，获得流量登上微博热搜后又被微博官方撤下。与此相反的是，明星绯闻、搞笑段子频繁登上微博热搜。互联网平台对用户内容的审查和操控，在侵害个体正常表达权的同时，也对由个体组成的自组织的信息传播造行为造成侵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减权。

4.2 受众方面：数字鸿沟，知识下沉困难

网络自组织的发起、行动、宣传皆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活动场域在网络空间，其传播对象具有一定特性，即用户有能力接触互联网并能够熟练操作。在此前提下，以月经安心行动为例，网络自组织在进行理念宣传时，受众往往不是最需要他们去帮助赋权的人。数字鸿沟是一个对传播学者而言并不陌生的新名词（祝建华，2002）。数字鸿沟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全球鸿沟，指的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因特网接入上存在的差距。其次是社会鸿沟，其关注的是每个国家内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的差距。第三是民主鸿沟，强调的是人们在是否使用数字技术参与公共生活方面的差距^[3]。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

^[1] 指微博博主或者其发布内容的阅读量和推送量在一定时间内被限制，以使其热度降低。

^[2] 喻国明,韩婷.算法型信息分发:技术原理、机制创新与未来发展[J].新闻与传播研究

^[3] Norris, P.(2001).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普及率为67.0%^[1]，仍存在地区尚未普及互联网。

网络空间不仅搭建平台在时空上缩短距离，帮助受众更便捷的获取知识；同时也竖起一堵高墙，让知识只能在网络能够触及的范围内传播。被阻挡在网络空间外的受众最终变为另一种意义的“数字难民”，被隔绝在数字文化外，知识匮乏，处于“失权”的状态，所接触的新知识仅能依靠外力，自上而下进行渗透。

4.3 内容方面：性别污名，信息缺少把关

“污名”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最初指的是地位低下者身上的标记，这些地位低下者一般是奴隶、罪犯或叛徒等带有不光彩背景的人，污名的存在即提醒人们避免与他们接触。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2009）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并特意强调污名不是象征耻辱的证据，而是耻辱本身。同时，戈夫曼也对“污名化”做了系统性的阐述，他将该词引申为一个人实际的某些特征和想象应该成为的样子之间的差别特征^[2]。污名包括了承受污名者、施加污名者和污名化等几个重要角色，林克和费伦认为，当同时出现贴标签的现象、产生刻板印象、产生被区分的状态、产生身份受损以及受歧视等几大元素时，污名化的过程就出现了^[3]。

当前仍存在部分媒体通过性别议程设置，突出放大部分女性问题作为新闻的情况，女性被塑造为各种极端化形象，被人为污名化，从而导致在关于女性网络事件的讨论中，带有性别歧视、嘲讽、侮辱女性群体的言论比较突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在进行之初，就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评论里不乏“人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那点事”、“谁起的标题??? 你觉得合适吗??? 卫生巾这个标题不能换成卫生用品吗?? 是不是脑子有病!!!”等忽视女性群体需求的负面评论。该类负面评论经过发酵，极易引起网络舆情。

其次，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媒”，社交媒体便利的发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信息冗杂的结果。在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媒体个人化加剧了信息传播内容的泛滥。网络用户们聚焦于相关内容，进行搜索和讨论，然而在面对碎片化信息时，常常会被非理性的情绪左右，盲目发布、传播，容易使其他人被虚假信息蒙骗，使假新闻和谣言传播范围扩大。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 欧文·戈夫曼著.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商务印书馆,2009.

^[3] 管健.身份污名与认同融合——城市代际移民的社会表征研究[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网络自组织在进行传播活动时，不但作为‘原创者’发布内容，也作为‘传递者’转发内容，以此来吸引用户关注、加入。可以看出，组织对其形象的构建与发布的“内容”息息相关。然而在网络空间中，缺乏把关的原信息真假难辨。虚假信息传播容易误导公众，损害自组织公信力，有碍于群体赋权和后续相关行动的进行。

4.4 本章小结

从网络自组织传播效果、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三方面进行分析，能够看出，首先，平台对信息的操控，容易使自组织在网络空间中变成“孤岛”状态，抑制自组织信息传播的效果，在影响自群体赋权的同时，损害了公民权力，造成对公共议题空间的侵占；其次，数字鸿沟的存在局限了传播对象，自组织无法将知识与理念有效的传递给其最想要帮助赋权的人；最后，部分媒体的性别议程设置容易造成对女性群体的污名化，使性别议题事件在网络中的传播受阻，或引起网络舆情。此外，在冗杂的信息流中，缺乏把关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受众被虚假信息蒙骗，给自组织的传播带来风险，不实信息的传播会损害自组织专业形象，影响自组织声誉，导致自组织“减权”。

5. 赋权理论视角下女性网络自组织发展启示

5.1 平台方面：优化算法，保护公共议题空间

互联网作为“技术资源”，是女性网络自组织组成且发展的前提。而自组织能否通过传播增强个体‘权能’，取决于公共议题空间是否不被平台人为侵占。桑斯坦在其著作中就曾分析技术过滤机制对慎议民主和公共性的伤害，他认为，新媒体技术的个人信息定制服务以及无限过滤信息的机制会导致“回音壁效应”的产生，若人们只听到和相信与自己类似的观点，而无法接受到异质的信息，这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群体极化现象；并且，如果太少的信息供人选择，会导致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爱好而不是社会公益。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例如在魏则西事件中，大学生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自己的病情，并选择了一家在搜索页面排名靠前的医院进行治疗，结果因为治疗不当而失去了生命。事情发酵后，公众们指责百度罔顾公共利益，为了企业牟利，使用了“竞价排名”的方式把非正规医院发到了靠前的搜索结果内。在公众的舆论下，国家网

信办介入事件调查，责令百度进行整改。企业人为的操控不仅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侵占。在社交平台内，也损害了公民的参与权与表达权。平台需要以身作则，保护公共议题空间的完整，完善算法机制，对用户言论进行科学筛选，尊重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理性对待公众表达。

除此之外，政府也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平台进行管控，防止资本左右信息资源的现象出现。同时，政府还需做好对公众的引导，使公众对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商业力量保持警惕与清醒，关注自身权益。

5.2 内容方面：去污名化，帮助提升个体效能

性别议题在互联网中已成为一个热门议题，新浪微博中针对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好事不提女，坏事不提男#阅读量高达6391.7万。此外，公众人物在讨论性别议题时，也被网民“贴标签”，从而引起舆论的案例频频出现。受众的认知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媒体传播失职。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应做到客观理性，唤醒受众“同理心”，培养一片去污名化的土壤，而不是突出个别元素，加深公众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与污名。

面对缺乏把关的、海量的信息内容，自组织在转发时应该主动担当“把关人”的角色，对信息实现最大程度追根溯源，确保信息真实性，维护自组织信誉，保护自组织权能。另一方面，自组织应做到对发布内容进行精简，减少转发内容，降低对不实信息的传播概率，并以原创内容为主进行传播和形象构建。

在原创内容中，不仅要注重专业性的阐释，也要注重情感层面的表达。通过唤起共情与认同的方式，吸引用户进行转发、评论，增强自身影响力与权威性。

随着声量的不断扩大，自组织在进行信息传播的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责任，作为能够引导个体的外部力量，自组织在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发声和内容输出时，要注重内容选题，从提高思想意识出发，帮助个体提升性别意识，认清自身所处地位，提高思想水平。并通过优质的内容和活动，帮助女性提升个体效能，激发其能动性，推进实现自我赋权。

5.3 受众方面：线上线下，启发提升双线并重

(1) 建立专业项目，线下启发赋能

从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进行过程中可以看出，女性自我效能感的启发并不是来源于特定的培训或组织的介入，她们的共同点在于接受过教育或拥有一项特长技

能，这对帮助线下受众赋权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资源作为赋权的前提条件，有利于促进个人权能感的提升，教育资源的不平均，思想层面的落后，无一不是是受众赋权的“绊脚石”。自组织可通过展开社会工作的方式和组织主题活动的方式，建立专业援助性项目，提高女性生活水平，使女性拥有并控制一定的物质资源。如予她同行基金会联合明星开展月经安心行动，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少女捐物卫生巾，并亲赴当地开展生理健康知识讲座。其次，自组织可开展相关技能培训，培养提升线下受众专业能力，增加个体自身的“造血功能”，帮助女性改善生活现状，增强女性对物质资源的控制能力。通过活动和培训的方式，启发受众自我效能感，为其“赋能”，促进受众能够进行自我赋权。

(2) 双线同时推进，提升媒介素养

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信息茧房和数字鸿沟对于受众的负面影响。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概括地说，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主要包括公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

针对熟悉于网络空间中的受众，一方面应提升他们的信息素养，使受众能够理性辨别信息真伪，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避免盲目相信所看到的信息。另一方面，应提升他们的新媒介素养，新媒介素养是指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的背景下，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构建更大、更好的社交网络，应该掌握的新的能力。受众应具备导航能力，以确保在网络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实现对信息的有效找寻，其次，受众应具备信息的组织和联通能力，帮助他们快速的将涌入他们生活的信息和无意义的牢骚组织在一起并快速理解。最重要的是，受众应具备怀疑精神和道德素养，人们通过互联网相关联，怀疑精神能够帮助淘汰错误的观点，道德素养能够敦促人们发布透明可信的信息，提升自我价值。

针对那些对网络空间感到陌生的受众，自组织要重视线下行动的赋权作用，在为受众带去物资补助的同时，也应帮助受众接触互联网，从接受能力强的年轻人入手，帮助他们提高判断、筛选不良信息的能力，并提供先进的观点，帮助受众打开视野，在做到为受众赋权的同时，推动他们进行自我赋权。

5.4 本章小结

平台应从自身出发，优化算法机制，尊重公民合理的表达权，帮助维护公共议题空间的完整，方便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也应重视其性别议程设置，培养去污名化的土壤，帮助受众建立“同理心”。自组织在线上进行宣传时，应主动充当“把关人”角色，对信息进行筛选，确保其真实性，此外，还应重视原创内容的生产，秉承原创为王的观念，提升自身专业性与权威性，并注重内容选题，帮助女性提升个体效能感。与此同时，针对受众，一方面自组织要重视线下行动的作用，启动援助项目，依靠线下行动使女性获得一定可掌控的资源，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并通过技能培训的手段传播知识，帮助个体接触互联网，打开视野。另一方面，需要提升受众自身媒介素养，尤其是新媒介素养。自组织可通过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的模式，对受众的媒介素养进行有意识培养。自组织可以以接收能力强的年轻人为起点，使“数字难民”转变为“数字桥梁”，在作为“外力”帮助赋权的同时，也推动个体进行自我赋权。

6. 结语

我们早已进入网络社会，人们不仅生存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网络空间内。传统的传播模式被打破，“人人皆媒”使得个体能够通过网络寻找组织，加入组织并进行集体行动，实现赋权。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志愿者组织为例，该自组织完全建立于网络空间，在线上进行统筹与行动。在自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是个体能够获得信息、参与行动的前提，个人意识的觉醒，自我效能的提升作为能动性，推动个体加入自组织。而自组织通过开展集体行动，在保护女性医护人员身体权益的同时，群体对外辐射能力逐步增强，实现群体赋权，推动公共政策向前发展，对公众刻板印象进行抵制，并发起后续相关活动，做到为女性群体赋权。

另一方面，要重视传播在赋权过程中的作用，合理的传播策略能够帮助自组织更好的实现赋权，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组织在依靠平台进行宣传的同时，不仅要警惕平台中真假难辨的信息，其传播效果也受到平台掣肘。除此之外，信息茧房、女性污名化与数字鸿沟等问题依然存在，对自组织的赋权行动形成阻碍。

值得肯定的是，该自组织凭借新媒体平台进行集体行动，帮助缓解一线生理卫生用品缺失的紧急情况。另外，也帮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限制她们的社会惯例，号召打破“月经羞耻”思想，维护女性合理身体权益。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和人力的限制，无法获得更详细的内部资料，对该行动进行深入分析。目前学界对于女性自组织行动研究主要聚焦于线下行动的权力倡导，对线上行动的建立与发展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的论证是探索性的，希望能给予其他学者启示，关注网络空间内自组织的赋权现象。

参考文献

- [1] E. M. Rogers & A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 [2] Harman, S. (2016). Ebola, gender and conspicuously invisible wome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3),524-541.
- [3] hooks, B. (1986). Sisterhood: Political solidarity between women. *Feminist Review*, 23(1), 125-138.
- [4] Mehra,B., Merkel, C., Bishop, A.P. The Internet for Empowerment of Minority and Marginalized Users.[J]. *New Media & Society*, 2004, 6(6):781-802.
- [5] Naila Kabeer.Resources,Agency,Achievements: Re-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J].*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30* (1999) ,435-464.
- [6] Norris, P.(2001).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Rogers,E.M, Singhal, A.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J].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3, 27(1):67-85.
- [8] Robert Putnam,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9] Zimmerman, M.A.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ssues and Illustr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5, 23(5):581-599.
- [10] 蔡婉怡,刘圣中.赋权理论视角下我国女性公务员心理失衡问题的解决途径 [J].*领导科学*,2017(30):49-51.
- [11] 陈楚红,谢毅.从污名化现象看新媒介赋权重心的偏离[J].*新闻世界*,2017(05):77-79.
- [12] 程玥. 赋权理论下个案介入再婚妇女人际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
- [13] 崔娇娇. 新媒介赋权与连接性行动: 公益众筹的网络动员研究[D].南京大学,2016.
- [14] 邓倩.互联网时代传播赋权研究[D].武汉大学,2014.

- [15] 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J].开放时代,2011(01):124-145.
- [16]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76-81.
- [17] 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学术研究,2004(12):73-78.
- [18] 冯剑侠.#看见女性劳动者#: 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与话语行动主义[J].新闻记者,2020(10):32-44.
- [19] 辜泓.从“传递观”到“仪式观”:“互联网+”时代品牌传播转型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7.
- [20] 管健.身份污名与认同融合——城市代际移民的社会表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 [21] 何堃,马永贞.妇女赋权:赋权理论分析社会工作案例[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08):6.
- [22] 黄锐.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06):84-91.
- [23] 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体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J].新闻记者,2015(7):28-35.
- [24] 黄月琴.新媒体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06):140-145+164.
- [25] 李程.新媒体赋权视角下的网络传播景象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2019.
- [26] 李文杰.微博反腐:从“自我赋权”到“娱乐至死”[J].新媒体研究,2016,2(04):36-37.
- [27] 梁辰曦.新媒体赋权与公民表达研究[D].重庆大学,2019.
- [28] 梁颀,刘华.互联网赋权研究:进程与问题[J].东南传播,2013(04):14-17.
- [29] 林婷婷.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之我见——基于赋权理论下的“打工妹”[J].青年与社会,2013(08):106.
- [30] 刘晶晶.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赋权现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
- [31] 刘紫君.社交网络用户正能量信息感知价值与接受行为和正向行为改变的关系影响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9.
- [32] 陆晔.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A].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化进程中的传媒教育与传媒研究--第二届中国传

- 播学论坛论文汇编（上册）[C].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播学论坛,2002:9.
- [33] 吕迪.新媒体环境下女性赋权的问题与困境研究[J].科技传播,2020,12(17):170-171.
- [34] 欧文·戈夫曼著.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商务印书馆,2009.
- [35] 师曾志,金锦萍.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36] 师曾志.新媒介赋权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3:73-93.
- [37] 师曾志、胡泳等著.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
- [38] 舒仁凯.从个体能力到集体行动——国外赋权理论发展研究[D].南昌大学,2018.
- [39] 孙晓珍.社会工作赋权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女性素质提升[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23):230-231.
- [40] 唐咏.中国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家,2009(01):18-20.
- [41] 王真.从街头到网络:赋权理论视角下的女性权利倡导[D].华东理工大学,2014.
- [42] 西爱琴,单浩耘,霍佳鑫,刘志燕.女性经济赋权:理论、实践与研究进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0,32(05):100-112.
- [43] 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2-31.
- [44] 徐智,高山.网络女性自治区中的性别歧视内化——自媒体美妆视频中的女性嫌恶现象及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9,41(06):145-163.
- [45] 喻国明,韩婷.算法型信息分发:技术原理、机制创新与未来发展[J].新闻与传播研究.
- [46] 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6(10):6-27.
- [47] 张欢欢,陶传进.“赋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S公益项目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0(03):161-168.

- [48] 张家栋.赋权理论在单亲母亲群体中的运用[J].法制与社会,2017(19):291-292.
- [49] 郑唯.网络社会中的愤青现象解读[J].当代青年研究,2016(01):56-61.
- [50] 郑永年,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东方出版社, 2013.

后 记

三年时光荏苒，硕士生涯即将走到尾声。有过困惑，但还是收获更多：收获了朋友、收获了知识、收获了思考模式，可以说，硕士三年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在想来，仍感慨万千。

在硕士论文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张淑芳副教授，她总是专注又博学的。她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引领者，也是我坚持选题、推进论文的动力。张老师对我的影响，在于认真对待学术，认真对待生活。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参加读书会不敢说话的“小白”，慢慢蜕变成能与同门进行学术交流，帮人指出问题，这其中离不开张老师对我们的鼓励与督促。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感谢他们包容我的缺点、我的坏脾气。我的父母是我坚强的后盾，谢谢他们让我知道就算我没那么优秀，也依然会有人这样爱我。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魏乔波，感谢她对我论文的帮助和我生活上的帮助，谢谢你给我兰州生活增添色彩，你真的是一个很可靠的姐姐。

感谢我的同门，谢谢你们每一次对我的鼓励。在我陷入迷茫的时候，帮助我一起寻找方向。希望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最后，感谢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的各位老师，感谢杨晓峰老师、石蓉蓉老师、王亚炜老师、杜建华老师、张翼老师、韩永林老师、王一婕老师在我求学期间对我的帮助和教导，我将永记于心。